

沙卡洛夫與蘇聯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

熊自健

一 引言

「時間過去了。戰爭回來了。叛亂蔓延着

田莊和鄉村，都燃燒着憤怒的火焰，

俄羅斯在她一向為淚所污的美麗中

却仍舊沒有變，

千世百世，依然是一個模樣。

啊，這兀鷹的迴翔和這母親的憂愁

還將繼續多久？」

布洛克 (A. Blok) 這首兀鷹的預言，顯示出俄國人永恆的悲劇。悲劇源於俄羅斯文學靈魂與政治靈魂的對立。俄國人有一個「神聖的不滿」的傳統，它曾經折磨過果戈里，困惱過別林斯基……到了廿世紀六十年代凝聚在沙卡洛夫 (A. Sakharov) 與索忍尼辛 (A. Solzhenitsyn) 的身上。這個「神聖的不滿」的傳統，給俄國人帶來一個福音接着一個福音，一個革命接着一個革命，一個囚徒跟着一個囚徒。它也帶給人類永恆的記憶與無比壯麗的人性尊嚴。現在讓我們來回顧蘇聯知識份子從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人權示威」所開始的「民主運動」，並且展望其歷史意義與前途。

二 從地下出版運動到民主運動

依照貝查也夫 (N. Berdyaev) 的說法，俄國的知識階級，是由社會各階層所形成的集團；他們是依觀念，而不是依共同的職業或經濟的地位而結合。知識階級常受某種觀念——大部份是社會觀念的驅使，並專心地獻身給它。因此俄國的知識階級具有宗派性與教條主義的特質^①。這個知識階級在十八世紀形成，並且沿着啓蒙運動走出第一步。爾後，歷經「十二月黨人運動」、

註① 貝查也夫著，鄭學稼譯，「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臺北黎明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再版，頁二九—卅。

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辯論、虛無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最後由列寧所領導的「職業家革命黨」與「無產階級專政」取得政權，延續至今^②。知識階級始終是俄國的領航者。

研究蘇聯的歷史學家們，都指出蘇聯內戰（一九一八——二一），使得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與「職業家革命黨」，轉變為「一黨專政」。由於一黨專政，政治上的反對力量，只能形成各種派系，從事活動；先後有工人反對派，左派反對派，右派反對派，聯合反對派……到了赫魯曉夫時期形成文化反對派（Cultural Opposition）^③。「文化反對派」運動的特徵是蘇聯的作家用手稿的方式流傳着他們的作品，出版業者出版打字的雜誌，藝術家舉辦半合法的藝展，戲劇家組織自己的劇團等活動，來反對蘇聯當局的文化政策。由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波蘭暴動，蘇聯當局開始鎮壓文化反對派。文化反對派轉入地下，孕育出一個新興勢力，此勢力不但反對官方文化，而且反對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及政策。此力量是由兩股相反的力量衝擊而成，一方面蘇聯社會羣衆希望能夠得到更多有關蘇聯社會及政治的情報，另一方面蘇聯當局則努力全面控制各種情報。這個新勢力稱爲「地下出版運動」（Samizdat）^④。自然的，蘇聯當局瞭解「地下出版運動」，比「文化反對派」更危險，所以他們以更強烈的態度壓制它。一九六五年逮捕辛雅夫斯基（Siniauskij）與丹尼爾（Daniel），罪名是他們在國外出版書籍。但是根據蘇聯憲法的規定：「爲符合人民利益並爲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保證蘇聯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會議、遊行及示威之自由。公民此種權利之保證爲：印刷所、紙張、公共場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爲實現此種權利所必要之物質條件，均供勞動者及其團體使用。蘇聯的知識份子抗議非法逮捕，要求公開審判，並且在同年十二月五日於普希金廣場示威，提出「尊重憲法」、「尊重人權」的口號，燃起了「民主運動」的火苗。

蘇聯的「地下出版運動」，曾孕育出三種反對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結晶。它們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督教意識形態」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⑤。

「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爲蘇聯政權爲了維持自己的利益，濫用、曲解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而並未真正實行馬列主義。因此爲了醫治蘇聯社會的病態，最重要的就是回到這個主義的真正原則：直接民主制、無階級社會……等。此派的代表人物有科

註② 關於俄國知識階級的活動與思想，請參閱 S. R. Tompkin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0) 與貝查也夫著「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

註③ 關於蘇聯各反對派的活動與思想，請參閱 R.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註④ A.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0) pp. 7, 10.

註⑤ *Ibid.*, p. 11.

斯特靈 (A. Kosterin)、格里郭倫科 (P. Grigorenko)、麥費德夫兄弟 (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雅基莫維奇 (I. Yakimovich)……等人^⑥。

支持「基督教意識形態」的人認為社會必須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則。他們懷着斯拉夫精神，強調俄羅斯救世主的角色。此派的代表人物有索忍尼辛、奧古索夫 (I. Ogurtsov)、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等。

最後，相信「自由主義」的人希望蘇聯能逐漸轉變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但仍保留公共組織或政府來擁有生產工具。此派的代表人物有沙卡洛夫、阿馬里克 (A. Amalrik)、李維諾夫 (P. Litvinov)……等。

根據阿馬里克的分析，所謂「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包括了上述三種意識形態，其間並沒有明顯的界線。支持者大都是蘇聯的知識份子，或者說是「專家階級」。這個階級是蘇聯發展科技與經濟的結果；他們只有在法治的情形下才能進行工作，所以他們是民主政權社會的基石^⑦。最主要的是此一階級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感覺到法治的重要，而開始冒個人之險向政府爭取；於是在蘇聯展開了震驚世界的「民主運動」。

三 民主運動的方式與內容

儘管參與民主運動的份子缺乏一個大型的組織，並且還有終極理想的不同；他們還是具備了許多共同的政治目標，一起為「民主」與「人權」而奮鬥。他們都避免使用武力，在合法的途徑中爭取下列共同的政治目標：

- (1) 法治。尊重憲法。
- (2) 取消出版檢查制度。言論，出版自由。
- (3) 反對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政治迫害，尊重人權。
- (4) 少數民族有遷徙自由，民族自決權。
- (5) 宗教信仰自由。
- (6) 反對干涉外國內政。(例如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⑧

註⑥ 關於此派人物的思想，請參閱陳璋津著，「蘇聯的不滿份子與歐共主義」，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十二期，頁五八一—六三。

註⑦ A. Amalrik, op. cit., pp.13-21.

註⑧ H. C. Bidulph "Protest Strategies of the Soviet Intellectual Opposition" ed. by R. L. Tokés, *Dissent in the USS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99.

此外，在政治解放自主性或依賴外國的壓力，市場經濟，多黨制度，外交政策……等問題上有大辯論^⑥。我們在這裡不討論其辯論的內容，只評介其達成政治目標所用的方法。這可以分爲：(1)不公開的抗議；(2)公開的抗議；(3)向世界公開；(4)內部的溝通四個部份來討論。

1. 不公開的抗議

早期的民主活動大都採取不公開的抗議方式，其中最普遍的是向蘇聯當局寫信，出版地下刊物報導各種政治迫害及人權運動的史實。採取此方式的理由有：(1)蘇聯的政治文化傾向以個人批評與建議的手段來解決政治衝突，達成目標；不同於中共運用羣衆動員與衝突的手段來達成政治目標。(2)冒險最小，可以避免嚴厲的刑罰。(3)對於由上而下的改革具有高度的期望。因爲赫魯曉夫時代的經驗，尙未證實他們不公開的抗議是徒勞無功的^⑦。

著名的抗議信有：(1)一九六六年蘇共廿三次代表大會前夕，廿五人聯名抗議恢復斯大林名譽與復活斯大林主義。(2)一九六七年索忍尼辛致第四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函，要求取消檢查制度，保障作家權利。(3)一九六八年有四百多人簽名抗議金斯基堡 (A. Ginzburg) 等人受審及葉森寧伏爾賓 (Yesenin-Volpin) 被捕。(4)一九六八年十月知識份子聯名抗議蘇軍侵入捷克。(5)一九七〇年由沙卡洛夫等三人上書布里茲涅夫陳述蘇聯民主化的歷史必然性及十五點計劃。同年沙卡洛夫等廿八位科學家聯名抗議麥費德夫和格里郭倫科被捕，並一起送往精神病院^⑧。

面對潮湧的不公開抗議活動，蘇聯當局除了逮捕、傳訊當事人之外，還施以開除黨籍、開除學籍、開除會籍、解除工作等處罰。一九六八年的大逮捕與入侵捷克事件，使得知識份子瞭解由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實現，因而轉向公開抗議的途徑，企圖製造更大的壓力來達成其政治目標。

2. 公開的抗議

公開的抗議活動以示威和散播傳單爲主。示威通常是少數人聚集在一個公共場所從事行動。一般而言，公開的抗議必須面臨三個問題：(1)選擇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公共場所。(2)發行一個可信與有效的溝通工具與媒介。(3)組織一個互相信賴的團體。因爲蘇聯 KGB 人員的滲透、分化及其恐嚇的技術，均無所不用其極，以致蘇聯境內只能有許多的小型團體從事公開的抗議，無法形成

註⑥ 關於民主運動中的辯論，請參閱史密斯著，丘爲君譯，「俄國人」，臺北龍田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初版，頁六五—一〇五。

註⑦ H. C. Biddulph, op. cit., pp. 103-104.

註⑧ 蘇聯民主運動的歷史與文件，請參閱 C. Garstenmaier, *The Voices of Silent* (New York: Hart Publish Company, Inc. 1972) pp. 123-259.

大型團體的組織與溝通網¹²。

著名的公開抗議活動有：(1)一九六七年普希金廣場的示威，抗議金斯堡事件。(2)一九六八年紅場示威，抗議入侵捷克。(3)一九六九年政治講壇(Political Platform)宣講「民主運動計劃」(The Program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4)一九六八年「蘇聯人權大事記」的出版(簡稱Chronicle)，溝通各個團體，報導人權運動的活動概況¹³。

公開抗議的長程目標是「聯盟」，旨在聯合各種、各地、各階層的民主運動人士，但是蘇聯當局採取將參加人士放逐國外的手段，使得聯盟無形瓦解。

3. 向世界公開

向世界公開蘇聯的政治迫害，以及人權運動的情形，以爭取國際的支持與製造國際輿論的壓力來爭取政治目標的達成；其中以索忍尼辛與沙卡洛夫進行的最爲積極。蘇聯境內民主運動的思想傾向不同，訴諸國外的壓力團體也就不同。其宣傳或投訴對象，大致上有四個方向：(1)國外的共黨與工人政黨。(2)西方的知識份子。(3)國際組織。(4)世界輿論。此類活動以一九七三年最爲熱烈¹⁴。

有目共睹的，向國際公開化之後，已經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同情與反應。歐洲共黨採取「非政治性」的和「無階級立場」的路線，強調人權的重要性。美國、英國、法國的科學家要求停止對沙卡洛夫與索忍尼辛的迫害，否則難以與蘇聯進行科技合作。西德反對黨要求布蘭德提名沙卡洛夫爲和平獎金候選人……等。其中最爲突出的是猶太人問題，全球猶太人要求蘇聯境內的猶太人有權遷往以色列居住。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反應，並沒有影響美蘇從一九七二年以來的和解政策。蘇聯當局放鬆了政治迫害，但是採取更嚴厲的刑罰，把民主運動者一批批地放逐出國。因此，蘇聯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遭遇了空前的打擊，只有靠內部的團結與喚醒人民來實現它的理想。

4. 內部的溝通

基於蘇聯知識份子傳統的宗派性與教條主義的傾向，使得民主運動的內部溝通困難重重，再加以KGB有計劃的分化、滲透與逮捕，更使得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不能建立。目前蘇聯民主運動的內部溝通還是以地下出版物爲主，最主要的人物是雅各(P. Yakir)，但地下出版在發行上面臨一種左右爲難的困境。如果公開發行，勢必帶來迫害；如果秘密發行，則政治影響力不大。目

註¹² H. C. Biddv1ph, op. cit., pp. 108-109.

註¹³ See C. Gerstemaier, op. cit., pp. 123-259.

註¹⁴ 向世界公開的實況，請參閱史密斯著，「俄國人」，頁六五—一八〇。

前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發行方式。例如 *Politicheskii Dnevnik* (政治日記) 在小圈子中發行, *Obshchestvennye Problemy* (社會問題) 公開發行並可郵購, 但是避免討論當前的蘇聯問題; 人權運動大事記 (*Chronicle*) 則儘量伸張它的情報網, 但是它的主編則在地下活動^⑤。

此外, 他們還藉助西方的廣播及俄國的流亡團體來支援他們的工作。

在蘇聯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中, 以沙卡洛夫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中堅。沙卡洛夫從一九六八年起成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現在讓我們來研究分析他的思想與領導, 並展望其歷史意義與前途。

四 沙卡洛夫的角色與思想

沙卡洛夫生於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大學畢業, 因為物理方面的才華得免直接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留在後方生產與參與研究。廿六歲獲得博士學位。一九四八年成為蘇聯研究發展核子武器的一員。一九五三年蘇聯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 他被稱為「氫彈之父」, 並當選為蘇聯國家科學院院士。

一九五八年沙卡洛夫轉變成不滿份子 (*dissenter*), 首先批評蘇聯的核子試爆, 強調核子試爆對人類與自然的傷害。同年他又反對赫魯曉夫的教育改革, 認為學生不應該花太多的時間在工廠與農場工作, 應該注重物理與數學的訓練。一九六一、六二年再反對核子試爆, 蘇聯當局置之不理。他感到無力阻止他認為錯誤的事, 於是懷着一種深刻「有罪」的感受, 思考蘇聯與人類的命運。一九六四年他在蘇聯的科學會議上批評李森科 (*Lysenko*) 主義, 結識了生物學家麥費德夫。從麥費德夫處閱讀地下出版刊物並與麥費德夫兄弟辯論各種蘇聯問題。一九六六年蘇共廿三大前夕, 沙卡洛夫簽名反對恢復斯大林名譽, 同年寫信給布里茲涅夫抗議辛雅夫斯基——丹尼爾事件。一九六七年寫信給聯共中央抗議金斯堡事件, 提倡人權運動。一九六八年六月出版「關於人類進步、和平共處與學術自由的反省」(*Reflection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與「布拉格之春」相互輝映, 此書廣泛地在蘇聯知識份子間流傳討論。沙卡洛夫成了民主運動的領導者。

一九六九年沙卡洛夫參與「民主運動計劃」, 一九七〇年與麥費德夫、杜金 (*V.F. Turchin*) 上書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 陳述蘇聯民主化的歷史必然性, 並提出十五點計劃; 一九七〇年抗議列寧格勒大審判, 並且關心猶太人問題; 一九七一年出版備忘錄 (*Memorandum*) 討論道德問題;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九月關心少數民族問題, 提倡民族自決, 並且提倡宗教自由; 一九七二年領導人權組織; 一九七三年向世界公開蘇聯的政治迫害以及人權運動的情形, 受到國內空前的攻擊, 而有所謂「反

註⑤ T. Friedgat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Dimension and Perspectives" ed. by R. L. Tokés, *Dissent in the USSR*, pp. 127-128.

沙卡洛夫運動」的出現。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被放逐，他發表批評索忍尼辛致蘇聯當局的公開信；一九七五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並在英國出版「祖國與世界」(My Country and the World)，作為「進步、和平共處與學術自由」的續篇^⑩。如今沙卡洛夫仍繼續領導蘇聯境內的民主運動。他的處境曾經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H. Smith)如此報導：

「沙卡洛夫向我承認，在一九七三年的『反沙卡洛夫運動』之後，他已經變得十分消極頹喪。他還曾經打算到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機構去。他已經動手為他的繼子女們，籌劃進麻省理工學院的事宜。他知道，遲早他們也會被驅逐的。原則上，他希望能够在外面待上一年。但他也承認，一旦出去，恐怕也沒有回莫斯科的機會了。由於這種顧慮，在索忍尼辛被驅逐出境後，他已經打消這個念頭。道德上的驅策，使他覺得應當留下來，不該私自離開所有其他的不滿份子。」^⑪

我們可以瞭解今天沙卡洛夫的奮鬥並不只是政治上的奮鬥，而且是道德上的奮鬥。那麼，他所奮鬥的理想又是如何呢？大致上是：(1)科學與人道結合。(2)民主政治。(3)世界和平。

1. 科學與人道結合

基於沙卡洛夫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他深刻地瞭解科學給人類帶來正負兩面的價值。他分析了今天人類的危機：熱核子毀滅、饑餓、環境污染、資源涸竭、人口爆炸，喪失人性……並且提出解決之道。他相信只有依靠科學、自由、民主與和平的精神，才能解決今天人類的危機。他特別強調學術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的重要，因為只有在學術自由下，才能培養人類開放的心靈、合理的態度，而免於羣衆的神話(Mass Myth)與獨裁政治^⑫。

從科學與人道的立場出發，他批評馬列主義的教條性與專制性，並且驚訝於索忍尼辛的「宗教族長的浪漫主義」；驚訝於索忍尼辛對現代科學的懷疑態度與誹謗西方的親斯拉夫思想^⑬。可惜俄國本身缺乏哲學傳統，以致沙卡洛夫不能對「科學與道德」作哲學性的統合工作，貢獻給全人類新的哲學境界。

2. 民主政治

沙卡洛夫認為蘇聯民主化最大的障礙是斯大林主義。蘇聯的前途繫於對斯大林主義清算的成就，他盛讚「布拉格之春」及赫魯曉夫在這方面的努力^⑭。他在「進步、和平共處與學術自由」、「三人的信」、「祖國與世界」等著作中所一再提到的民主計劃，可予總結如下：

註⑩ See P. Dornan "Andrei Sakharov: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Scientist" ed. by R.L. Tokés *Dissent in the USSR*, pp. 354-366.

註⑪ 同註⑩，頁八七一—八八。

註⑫ A. Sakharov, *Progress,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pp. 25-48.

註⑬ 同註⑩，頁七五。

註⑭ 同註⑩，頁四九—五〇。

(1)反官僚政治，實施直接民主制。(2)蘇俄在一九六五年發動的經濟改革，應加深入和推廣；對於生產計劃、技術改革、原料供給、財政管理……等方面，應降低政府控制。(3)大致除了重工業、大型運輸業與郵電業以外，所有各種經濟事業與社會措施，應部份地廢止國有化；集體化農業亦應部份廢止。(4)大赦政治犯；其中包括特殊精神病院的囚犯以及因宗教信仰、民族主義傾向與企圖出國而被判罪的所有犯人。(5)制訂罷工自由的法律。(6)制訂保障信仰自由的法律條款。(7)制訂自由選擇居留地的法律。(8)制訂自由出國與自由回國的法律。(9)廢止所有各種形式的黨、政特權。(10)保障「加盟共和國」退盟的權利，少數民族有自決權。(11)實行多黨制。(12)加強民衆控制與民衆監察以保證對於最重大決議的公布與實施。(13)實行貨幣改革和盧布自由交換，限制對外貿易壟斷。(14)改革教育。提高教員生活水準，增加他們的自治權利。提高初級學校的水準。(15)取消檢查制度，言論、出版自由^②。

3. 世界和平

沙卡洛夫認爲世界的危機導源於各種人爲的分歧——如種族歧視、意識形態衝突、財富等——具有毀滅性的威脅。他提倡和平共處與國際合作來解決今天人類的危機^②。

關於和平共處方面，沙卡洛夫特別關心：(1)中蘇共戰爭問題。(2)美蘇和解問題。(3)裁軍問題。沙卡洛夫批評許多人誇大了中共的威脅，他認爲中共並沒有軍事上的能力來侵犯蘇聯。蘇聯當局強調中共威脅的用意，是因恐懼國內民主運動的發展，而想藉此轉移國人的視聽。他並且批評索忍尼辛主張開發西伯利亞，以避免與中共作戰的計劃。他認爲只有中蘇共逐步民主化，才能真正避免這場戰爭^③。

沙卡洛夫嚴厲指責一九七二年以來美蘇錯誤的「和解」。他說：「如果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沒有帶給蘇聯任何的民主運動，那將是危險的。在這場和解的遊戲中，西方已經接受了蘇聯開出的遊戲規則。……和解局勢不但使蘇聯通過了無法通過的難關，而且還使它聚集了更多的力量。」^④他認爲真正的和解是意識形態的和解；美國與蘇聯逐漸修正他們的意識形態而互相滙合（Convergence），才是真正的和解，才能給人類帶來和平，共同爲第三世界的開發而努力與合作^⑤。其次關於裁軍方面，他認爲

註② See A. Sakharov, V. F. Turchin and R. A. Medvedev "Suggestions for Reform" ed. by C. Gerstenmaier, *The Voices of Silent*, pp. 498-500. 沙卡洛夫著，王啓中摘譯，「祖國與世界」，臺北「大陸觀察」雜誌，第四卷第二期，頁六一。

註③ 同註②，頁三二一—二四。

註④ 轉引自 P. Dornan "A. Sakharov" op. cit., pp. 383-86.

註⑤ 同註④，頁七四。

註⑥ 同註⑤，頁七五—七七。

裁軍協議應該包括下列三點：第一初步協議：對於熱核子戰略武器發射的最高限度和整個力量，應規定起碼的比例平衡。……第二禁止戰略飛彈體系的擴散與改進。徹底禁止任何型態的多彈頭飛彈。……第三改進監察制度^{②6}。

關於國際合作方面，沙卡洛夫建議美蘇共同合作解決人類饑餓、人口過剩、環境污染等問題。他主張在「人權宣言」的精神下，從事世界政府的努力，使人類免於因分歧而帶來毀滅性的威脅^{②7}。

五 民主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蘇聯知識份子奮鬥了十三年的民主運動，還是處於孤立的局面。它並沒有獲得蘇聯的政黨、工人、農人、官僚與一般知識份子的普遍接受與支持。

工人與農人不接受民主運動的原因不外是：(1)生活水準的提高，使他們失去了鋌而走險的勇氣。(2)不能瞭解「自由」、「個人權利」的意義。(3)被官方的國家主義所吸引或為宣傳所麻痺。

一般知識份子與專家階級應該是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但是由於：(1)政治冷漠；(2)既得利益的保全；(3)思想的分歧與 KGB 的迫害，不易形成聯盟與大型組織的活動，因此無法在此階層展開蓬勃的民主運動。阿馬里克分析得好：「在我們國家裏雖然存在著一個階層，他們可以瞭解個人自由、法治及民主政府的重要，並且需要這些原則，所以他們變成了民主運動的基本支持者；但此階層中的絕大部份成員却又是如此的平庸，他們的思想方式又如此的具有公務員的官僚色彩，而他們最具獨力思考能力的成員又是如此被動，我實在懷疑民主運動能靠他們成功。」^{②8}

蘇聯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既是如此孤立，我們又如何來瞭解它所帶來的歷史意義呢？大部份的學者都把他們與「十二月黨人運動」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化派與斯拉夫派辯論」相提並論，認為他們的努力會帶來更壯烈、更偉大的運動。我們向蘇聯的民主運動人士致敬最高敬意。他們的奮鬥，給俄國「神聖的不滿」的傳統注入活力，給人性的尊嚴帶來光輝。他們的成功更可能帶給人類新的希望與和平，雖然這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實現的。

註^{②6} 沙卡洛夫著，王啓升摘譯，「祖國與世界」，

註^{②7} 同註^{②6}，頁七五—七七。

註^{②8} A. Amalrik, op. cit., p. 21.